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

徐杰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格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明显的“北上”和“内进”的趋势,且不同投资来源地表现出投资区位的差异。本文对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外商投资 区位特征 影响因素 对策建议

一、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

(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省际变化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 - 2002)的统计资料计算1994 - 2001年全国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见表1),结果表明:

1.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内蒙、辽宁、湖北各省区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上升势头,这些省区多地处长江三角洲和

环渤海湾地区,湖北省虽属中部地区,但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优越地理区位;

2.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各省区所占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些省份多地处东南沿海和西南大陆地区;

3. 其余各省份所占比例有升有降,变化趋势不明显;

4. 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来看,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北京、天津、浙江等沿海各省份一直居前10位。

表1 1994 - 2001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省际变化

	1994			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实际引 资金额 (万美元)	名 次	比 重 (%)
北京	137 157	7	4.15	155 290	8	3.72	159 286	8	3.52	216 800	7	4.56	168 368	7	4.14	176 818	9	3.77
天津	101 499	9	3.07	200 637	6	4.81	251 135	5	5.55	211 361	8	4.44	116 601	9	2.86	213 348	8	4.55
河北	50 948	14	1.54	82 587	10	1.98	110 064	10	2.43	142 868	9	3.00	67 923	12	1.67	66 989	13	1.43
山西	3 170	27	0.10	13 802	22	0.33	26 592	22	0.59	24 451	23	0.51	22 472	23	0.55	23 393	22	0.50
内蒙	4 007	26	0.12	7 186	24	0.17	7 325	25	0.16	9 082	25	0.19	10 568	25	0.26	10 703	23	0.23
辽宁	143 676	6	4.34	173 768	7	4.16	220 470	7	4.87	219 045	6	4.61	204 446	6	5.02	251 612	6	5.37
吉林	24 152	20	0.73	45 155	18	1.08	40 227	21	0.89	40 917	19	0.86	33 701	18	0.83	33 766	20	0.72
黑龙江	34 176	17	1.03	54 841	15	1.31	73 485	14	1.62	52 639	17	1.11	30 086	20	0.74	34 114	19	0.73
上海	247 309	5	7.47	394 094	4	9.44	422 536	3	9.34	360 150	4	7.57	316 014	4	7.76	429 159	3	9.15
江苏	376 315	3	11.37	521 009	2	12.49	543 511	2	12.01	663 179	2	13.94	642 550	2	15.78	691 482	2	15.75
浙江	114 441	8	3.46	152 050	9	3.64	150 345	9	3.32	131 802	10	2.77	161 266	8	3.96	221 162	7	4.72
安徽	37 000	16	1.12	50 661	17	1.21	43 443	20	0.96	27 673	22	0.58	33 672	19	0.78	33 672	21	0.72
福建	371 200	2	11.22	408 451	3	9.79	419 666	4	9.27	421 211	3	8.86	343 191	3	8.43	391 804	4	8.36
江西	26 168	19	0.79	30 068	21	0.72	47 768	19	1.06	46 496	18	0.98	22 724	22	0.56	39 575	16	0.84
山东	253 153	4	7.65	259 041	5	6.21	249 294	6	5.51	220 274	5	4.63	297 119	5	7.30	352 093	5	7.51
河南	38 567	15	1.17	52 356	16	1.25	69 204	16	1.53	61 654	16	1.30	56 403	14	1.39	45 729	15	0.98
湖北	60 183	13	1.82	68 004	13	1.63	79 019	13	1.75	97 294	11	2.05	94 368	10	2.32	118 860	10	2.54
湖南	32 511	18	0.98	70 344	12	1.69	91 702	11	2.03	81 816	13	1.72	67 833	13	1.67	81 011	12	1.73
广东	939 708	1	28.40	162 362	1	27.86	171 083	1	25.88	201 994	1	25.27	128 091	1	27.71	193 203	1	25.45
广西	81 506	12	2.46	65 618	14	1.57	87 986	12	1.94	88 613	12	1.86	52 466	15	1.29	38 416	17	0.82
海南	91 809	10	2.77	78 908	11	1.89	70 554	15	1.56	71 715	15	1.51	43 080	17	1.06	46 691	14	1.00
四川	88 859	11	2.69	42 544	19	1.02	63 521	17	1.40	80 335	14	1.69	68 130	11	1.67	83 837	11	1.79
贵州	6 363	24	0.19	3 138	27	0.07	4 977	26	0.11	4 535	26	0.10	2 501	27	0.06	2 829	27	0.06
云南	6 500	23	0.20	6 537	25	0.16	16 566	24	0.31	14 568	24	0.31	12 812	24	0.31	6457	25	0.14
陕西	23 880	21	0.72	32 509	20	0.78	62 816	18	1.39	30 010	21	0.63	28 842	21	0.71	35 174	18	0.75
甘肃	8 776	22	0.27	9 002	23	0.22	4 144	27	0.09	3 864	27	0.08	6 235	26	0.15	7 439	24	0.16
青海	241	29	0.01	100	29	0.01	247	30	0.01	—	—	—	—	—	3 469	26	0.08	
宁夏	727	28	0.02	555	28	0.01	671	29	0.01	1 865	29	0.04	1 741	29	0.04	1 680	29	0.04
新疆	4 830	25	0.15	6 390	26	0.15	2 472	28	0.05	2 167	28	0.05	1 911	28	0.05	2 035	28	0.04

说明:为比较方便,四川省包括重庆市。

资料来源: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 - 2002年)计算所得。

(二)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变化分析

表2显示了1994年以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实际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明显变化格局。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7年前东部实际引进外资徘徊下降,1998年后出现上升趋势。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趋势则由升转降。

表 2 1994 - 2001 年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 (%)

	1994	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东部	85.44	85.99	83.26	81.16	85.69	86.06
中部	7.86	9.22	10.43	9.11	8.84	8.76
西部	6.70	4.79	6.31	9.73	5.47	5.18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说明:东部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宁夏、陕西、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资料来源: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 - 2002 年)计算所得。

(三)南、中、北变化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引进外资的南北变化,表 3 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南部、中部和北部一些省份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实际引进外资较多的两个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所占比例出现显著下降,由 1994 年的 39.62 个百分点下降到 2001 年 33.81 个百分点;同期,中部 6 省份所占比例上升 7.6 个百分点,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北部省份也在波动中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表 3 1994 - 2001 年我国南、中、北部实际引进外资的变化 (%)

	1994	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广东、福建	39.62	37.65	35.13	34.13	36.14	33.81
浙江、江苏、上海 湖北、湖南、河南	26.27	30.14	29.98	29.35	32.88	33.87
山东、河北 北京、天津、辽宁	20.75	20.88	21.88	21.24	20.99	22.63

资料来源: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 - 2002 年)计算所得。

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出现明显扩散。这种扩散的总的趋势表现为:逐步由沿海省份向内陆省份(重要是中部省份)转移,由南部重点省份向北部地区转移,且中部地区首先出现明显增加,继而北部省份增幅加大并超过中部省份。这种变化可简单归纳为外资的“北上”和“内进”。

(四)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投资区位的差异

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以港澳台地区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已形成美日竞争,各国和地区外商踊跃问津之势。截至 2001 年底,来我国投资的国家 and 地区已达 150 多个,投资额居前 6 位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美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不同的投资国和投资地区在中国大陆投资区位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新加坡、港澳台地区的华人资本对大陆投资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选择上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南部地区。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港澳台地区对内陆的投资已开始出现分散化趋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北部、中部和大城市地区转移扩散。

与港澳台商投资区位相比,虽然欧美日韩在我国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它们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更加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以环渤海湾为核心的北部沿海地区。表 4 列出了第三次工业普查欧美日韩在我国投资企业的地区分布。从表中可以看出,欧洲 7 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在我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中部沿海地区,其次是北部沿海地区;不同于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在我国投资相对均衡地集中在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韩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相对较晚,在我国投资规

模较小,由于受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影响,目前韩国在我国投资高度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

表 4 欧美日韩在我国投资企业的地区分布

	项目	总计	地区分布 (%)				
			北部沿海	中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欧洲 7 国	企业数(个)	632	410	90	96	36	
	所占比重 (%)	100	30.6	45.0	9.9	10.5	4.0
美国	企业数(个)	2 434	843	974	219	271	127
	所占比重 (%)	100	34.6	40.0	9.0	11.1	5.2
日本	企业数(个)	2 742	1 013	1 136	331	196	63
	所占比重 (%)	100	36.9	41.4	12.2	7.1	2.3
韩国	企业数(个)	1 041	735	92	46	162	6
	所占比重 (%)	100	70.6	8.8	4.4	15.6	0.6

说明:北部沿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中部沿海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包括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全国三资工业企业数据库光盘》计算所得。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一)成本因素

古典区位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工资成本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据 Kravis 和 Lipsey(1982)的研究,劳动力工资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Yamawaki(1993)则发现,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日本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选择有着更加强烈的负影响,即倾向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区位;但 Swedenborg(1979)对瑞典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瑞典直接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Dunning(1980)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也发现,受资国生产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越高,工资率一般也相对较高;Mason 和 Howell(1992)则发现日本公司一般选择美国工资较高的地区去投资。从以上学者对工资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看,他们的分歧可能主要在于名义工资率和实际工资率的差别。所谓实际工资率是指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目前,对大多数外商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名义工资率,而是实际工资率。这些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演变过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正是由于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各地劳动力成本低廉,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外商投资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外商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名义工资水平较高,但实际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还低于其他地区。1987 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把总部迁往上海、北京,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

在成本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外,近年来的重要进展就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外商投资区位分析中。如 Williamson(1985)认为,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将促使外商投资的发生;Caves(1971)发现,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场、雇佣劳动力、谈判合同成本高时,外商直接投资将趋向于成本低的地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较快,市场体系较中西部地区完善,政府的工作效率较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始终保持较高

的外资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选择。Matiotti 和 Piscitello (1995) 年指出,信息成本的高低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商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外商投资于我国沿海地区,正是由于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有助于减少其信息费用。

(二) 市场因素

关于市场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早在克里斯塔勒(1998)和勒斯(1995)的著作中就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Woodward(1992)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以及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位置,与该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Swedenborg(1979)、Dunning(1980)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Friedman(1992)也发现,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贺灿飞(1999)的研究也表明,市场容量是决定我国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第二大经济因素。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东多西少的格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容量大,外资的增长也较快;第二,外商利用我国政策倾斜较多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将市场辐射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第三,港澳台地区、欧美国家的一些中小资本,在国内失去竞争优势,转移到我国东部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支撑其生存;第四,外商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活动,减少市场搜寻成本和获得市场的信息成本,同时根据市场反馈信息随时调整产品设计,使其产品生产“本地化”。

(三) 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集聚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的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按照波特(porter, 1990)的观点,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特定的服务设施和熟练劳动力,具有良好的区域形象以及大量产业的集中等;Head, Ries and Swenson(1995)认为,集聚经济对外资制造业工厂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正影响,这种集聚经济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卢格尔和谢蒂(Luger and Shetty, 1985)通过对三位数产业(标准产业分类)的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围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利用 1974 - 1990 年瑞典单个跨国企业以及它们在 18 个国家制造业工厂的数据,布劳纳耶尔和斯文森(Braunerhjelm and Swensson, 1996)同样证实区位化经济吸引了瑞典直接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也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制造业比较发达,基础设施状况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好,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和协作。

(四) 制度因素

一个地区的政策、文化相关性、发展规划等制度因素也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影响。Dunning(1993)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与制度因素有关的变量包括: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地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惯例以及政

治差异、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Lall 和 Siddharthan(1982)发现外资企业在美国的经营活动与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godo(1978)发现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并不是规划本身,而是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对外商有吸引力;Veuglers(1991)采用语言变量代表文化相关性,并发现该变量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内部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联系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分布格局,我们可以考察制度因素对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赋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上个世纪 80 年代,上海根据国家的外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地方性法规,1990 年国家又作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此为契机,上海大规模吸引外资,加速了向外向型经济功能的转变。同样,文化相关性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港澳台与广东、福建不仅地域相邻,而且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也成为海外华人进入广东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风险。

(五) 现有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一个地区的现有外商投资规模对吸引外资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贺灿飞(1999)的研究表明,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存在“区域性自我加速”机制,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模式呈现一定程度的刚性。现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特殊贡献,主要原因是外商投资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及信息成本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性制约作用。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市场体系发育相对完善,有较长的与外商投资者接触的历史,因而对于引进外资活动较熟悉,投资的风险相对小。第二,随着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从试探性走向成熟期,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竞相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占领我国区域市场,维护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寡头垄断的防御性对外投资策略也会导致新来外商投资倾向于同一市场。

三、我国中西部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虽然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北上”和“内进”的趋势,但毕竟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中西部地区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大力快速吸引外资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一) 把握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帮助厂商降低成本

外商来中国投资主要动机是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我们就在投资环境上创造有利条件。就目前的现状,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成本最主要的因素。在劳动力要素上,除了价格低廉外,劳动力的素质也十分重要。尽管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工资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低工资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工业生产效率低下,这种低工资成本的优势就会完全抵消。目前中西部的效率工资水平平均要比东部地区低 5 ~ 9 %。因此中西部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各类职业教育,不断提高当地劳动力素质。在土地要素上,要在降低土地使用价格的同时,关注厂址周围的环境,建立完好的基础设施。考虑投资者的总成本基准和成本可替代以及区位选择上的惰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所降低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运输所增加的成本,才能吸引外商考虑在这些区位投资。

(下转第 63 页)

IMD 是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简称。IMD 提出了衡量科技国际竞争力发展的三大原则,并根据这三个原则构造了 5 个子指标系统:研发财力资源、研发人力资源、技术管理状况、科学环境状况、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从 1999 年起,这 5 个子系统包括设计出来的 26 个具体指标。它们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形成一个较高层次的总指标系统来综合反映一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状况。参见《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 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壁垒报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规章新编》(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

皮书》编委会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2),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

6. 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编著:《1999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7. 薛澜、沈群红、王书贵:《全球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布局——基于跨国公司在华独立研发机构行业分布差异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3)。
8. 李德荣 编译:《跨国公司的中国之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9. 《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11. 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编著:《2001 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1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Q)

(上接第 51 页)

同时,信息成本(风险因素)也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扩大市场开放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完善市场建设,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谈判到投资纳入国际化操作,以减少外商投资的市场与非市场风险,采取一套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市场经济改革政策,尽快健全各种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机制,改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二) 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西部地区要想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工业的配套能力,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具体来讲,要做到:(1)着力提升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要充分发挥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的优势。只有充分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才能以强劲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注重城市中服务业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金融、服务、邮电通讯、法律、零售等敏感领域倾斜性地开放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集聚效应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结合本地已有的有一定竞争力的特定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强化特定产业的集聚效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4)结合本地已有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该国家或地区的针对性招商和在本地完善有针对性的软环境配套措施,形成有特定国家或地区特色的产业园区,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5)针对已在本地投资的外商,制定一系列动态性的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其再投资,形成特定厂商的集聚效应。

(三) 积极营造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较大影响。中西部要加大引资步伐,必然要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优良、宽松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讲,要注意以下两点:(1)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并真正落实。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和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有许多开创性和探索性问题,容易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大外商投资的风险。依许多投资者的观点: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区域差异,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

更有区域差异,而投资者所接受到的政策不稳定性,区域差异最大。因此,中西部在引资中应尽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拟制定的政策要真正落实,使每一个办事人员和决策者在引进外资上具有同样的认识和积极性;(2)中西部地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乏力,往往存在乱摊派、交过头税的现象,而且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远不如东部,致使中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水平高,不利于外商投资的进入。因此,在引资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来说,要坚决制止乱摊派,对各种税费要及时进行清理;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在减免方面对中西部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

(四) 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投资环境

中西部地区在引资过程中不仅要创造适宜投资者行为的环境,而且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投资环境。否则,投资者根本了解不到有关环境信息。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当地投资环境的优越性,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构建区位投资收益模型,通过将当地要素输入模型,给投资者以投入收益的定量分析结果,这样更易于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并形成实实在在的环境感受。

参考文献:

1. Dunning, John H., 1980. "Toward an electr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9 - 31.
2. Gross, R., Trevino L.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an analysis by Country of Orig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1): 139 - 155.
3. Wei, S.J., 1995.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China Reached its Potential?" *China Economic Review*, 6:18 - 30.
4.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80:190 - 207.
5. 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载《经济研究》,1997(12)。
6. 魏后凯:《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11)。
7. 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载《地理学报》,1999(3)。
8. 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载《地理学报》,1996(5)。
9. 吴丰:《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与西部利用外资分析》,载《国际经贸探索》,2002(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N)